



#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3

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路上，尽管我努力工作，也曾遭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我仍然不变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而今，已经耄耋的我，可以无愧地说：我真正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把我的强国心付诸实现，献给了祖辈期望她强大的这块土地。

### 牢记祖父的教诲“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 风雨人生路，漫漫数十载。

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散。可我的眼前却总是清晰地浮现出一位古稀老人慈祥而充满期望地嘱托孩子的情景：“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海外华侨将中国称呼为“唐山”）那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满九岁的我，那位老人就是我最尊敬的祖父。“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这句话是祖父对我最真诚的期许与嘱托，成为伴我一生的座右铭。

祖父是钟家在印尼漂泊的第三代传人。生在邦加，长在印尼，最后也长眠在那个他奋斗了一生的小岛。然而我明白，纵然身在海外他乡，祖父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辈的故土。他把一生赚来的财富贡献给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我心里默念着，“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几年之后，正是这句话伴我漂洋过海，回到了令他魂牵梦萦却永不能到达的中国。归国的客轮上，伴着《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声与期待，我带头将所携带的贵重财物捐献给祖国的抗美援朝事业。

1951年回国后，我便考入天津大学水利系港口水道专业。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由于社会上极左思潮对“海外关系”的偏见，归侨难免受歧视，这些都挡不住我对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向往，挡不住我对知识的渴求。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一工程处（天津）。从1955年到1977年在基层单位工作的22年中，坚持发明创造，在生产活动中攻克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推动了工程的迅速发展。在基层单位的22年中，我参与了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活动等大大小小工程百余项。一共完成了33项任务，取得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31项。其中有6项属于新工艺、新发明、新创造。

在基层单位的22年中，我荣获了先进工作者和科技发明等勋章、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件。其中直辖市级、部委级共10件，工程局和

单位共8件。其中，生产模范14枚，科技发明2枚，抗震救灾2枚。除了“文化革命”期间不评奖外，我几乎年年获奖。特别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归侨先进分子等荣誉，使我深受鼓舞。

在基层单位工作的22年中，我在逆境中努力创造出成绩。在经常受到表彰的同时，也经常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当时我心中口号是：“小车不倒只管推”。22年中我被迫写出几十万的思想检查，仅在1981年，基层单位落实中央政策，通过交通部正式退回给我的交代材料就有18份186页。

1957年遇到了我第二个贵人，交通部刘济舟总工程师，在他的支持下，用先进工艺解决了建造码头打桩裂桩问题，从而使停工许久的码头施工工程得以恢复。

以后，又建造了第一个自动化混凝土搅拌机，改造成机械化预制厂，解决了军用码头建造港际托运海运方式的问题，大大促进了港口施工建设的进度。

“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武斗迫使生产停顿。我带动工人师傅，辛苦了一年多，建造了6.5M和4.6M高的两尊混凝土剁斧石毛主席像和批量生产35cm的吹塑小站像。可悲的是，最后被当成“

反革命”强迫劳动达三年之久，还差一点蹲20年监牢，幸亏天津市没有批准。

被抄家、扫地出门、监督劳动期间，我还和工人们一起制造了一台200吨船用液压机。我被抄家时，许多书信、施工日记、技术总结、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纪念邮票、珍贵的族谱，都被抄走了。我最伤心的是音乐书籍、唱盘、留声机、在印尼获得的奖状。幸亏小提琴被儿子提走了放在他朋友家，我这把名贵的小提琴才逃过一劫。

回国前，我一有时间就拉琴，每隔几周就去剧院听交响乐，回国后至今竟一次都没有再去过剧院欣赏交响乐。拉小提琴被批判是“封、资、修”，我听党的话，不让拉琴就不拉。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一直没再动我心爱的琴。

抄家之后没过几天，我们就从36所的两间房子的住处被扫地出门，一家6口迁到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小砖房的千间宿舍，房顶是用木檩条搭起来的，又黑又潮，不得带家具，只带日用品和衣服。没有床铺，头几天全家都睡在砖头铺成的地面上。睡了几天，我才找来些木板，板皮，搭了一个三层的床铺，好像火车的硬席卧铺一样。底下我们两个大人睡，第二层老二，第三层老大和老

三，我岳母睡在只有两平方米的小厨房里。没有上下水，公共厕所在一排房子的最东头，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大茅坑。

生活的艰苦可以忍受，但精神和政治上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在那里受了四年的罪，饱尝各种辛酸。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我们才终于离开千间宿舍，搬到64所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自来水和厕所都有了，生活才正常起来。

在下放到基层工作的这些年，尤其是“文革”遭受迫害的岁月中，我所能做的就是加大工作力度，用成绩来表现自己的坦然和证实自己的忠诚。

从1958年到“文革”结束，我每年都获得奖励和荣誉。而可笑的是，我一边在创造着各种成绩，获得各种荣誉，一边又在不断地被打倒。有几次，上午领导给我佩戴奖状，下午开我的批判会。

这段充满荣誉却又不断被批斗的生活，看似荒唐，却饱含了委屈与艰辛，但是我从没想要放弃。我得摔打我的筋骨，这是阿公告诫并期望我做到的。无论遭受怎样的不公和冤屈，我都不会停下为祖国作贡献的步伐，只要有了成果，我的心中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未完